

### 期待上海书展 关注国史修订

本周在上海举办的上海书展成为出版业关注的焦点。据统计,全国470余家出版单位的420多项读书文化活动在书展亮相。书展还为读者准备了15万余种图书,并特设版权产业园、数字出版馆,首设少儿馆、铸书工具专题馆等。

另据报道,300余名人士聚会上海书展,其中有作家莫言、王安忆、麦家、郑渊洁、陈丹燕、朱天文、钱文忠、六六;演艺界人士李连杰、周立波、靳羽西、大山、关之琳、吕良伟;主持人曹景平、梁文道等。他们将带来一系列文化讲座、新书见面会、签售会,成为本届书展的一个个焦点。

以《双面胶》和《蜗居》名声大噪的六六,将携新作《心术》在上海亮相。这部作品讲了与住房同样重要的问题——看病。不过,虽然说是医患关系,但六六没有刻意去揭露黑幕。她说:“揭黑幕,骂医生,对我而言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很能吸引眼球。但其结果是,我们越发怀疑这世界的真善。”

《心术》已率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刊登。小说讲述了一群富有朝气的年轻医生,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故事。六六说,她写《心术》是希望在医患之间架一座桥。

六六的平和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冷静。《寄语点点:一位父亲的家书》也在上海书展亮相。该书是资深传媒人周志懿先生在与孩子分别期间写给孩子的家信集。书中提出了如何正确引导孩子成长的问题,并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悌仁爱,因而成为图书出版领域反“三俗”的典型。据说,此次上海书展将推出一大批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新书及经典作品。

我们希望的是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新书好看、耐读。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要重新修订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引发文化界和媒体的热议。据报道,2005年,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今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但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中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俊先生以“存有缺陷、阅读不便”回应了媒体“为何重修国史”的疑问。他进一步解释说,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这次修订要彻底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洋洋“国史”重新修订,这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

被称为“青春文学王国的绝对霸主”的郭敬明,今夏推出了全新奇幻之作《临界·爵迹》。据说,该作将以首印200万册的天文数字发售,缔造全国印量最新纪录。郭敬明说:“《临界·爵迹》不同于10年前的《幻城》,可以说我在这个新的故事里使用了比《幻城》复杂五倍以上的庞大设定。十年过去了,我相信自己现在的小说技巧和创作经验足以支撑起这个故事,创造出更为绚烂的奇幻世界。”

郭敬明的自信足以支撑200万册的天文数字,但他的奇幻世界有多绚烂还有待于更客观的评价。(赵亦冬)

### 书情报

## 黄全愈教育文集

作者:黄全愈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第一版



这是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教授集20年时间对中美教育问题研究思考的理论总结。在书中,黄教授对比中美教育的差异,反思中国当前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只有素质教育能够救中国”的思想。

这套文集由《美式校园——素质教育在美国》、《望子成人——家庭教育在美国》、《孩子就是孩子——玩的教育在美国》、《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等十本书组成。

文集的特点是:用生动真实的故事和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中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同。

### 《扫除力》

作者:坪田光洋(日)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扫除力”一词出自坪田光洋“扫除力”系列图书,是指每个人都具有的获取幸福的能力。“扫除力”与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扫除”并不相同,它是要你在扫除的时候呼唤心灵的力量,创建属于个人的、可掌控的能力。

作者认为,“清洁”是能够实现梦想的人的共同点。忙碌的人们应该经常打扫房间、清理钱包及手机、电脑里的信息,要清除体内的毒素和脂肪,别在心中积攒灰尘。他还提出要“在污秽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问题点,扫除各房间的负面能量,做理想的自己。”

## 商业广告植入图书

# 文学还是营销?

袁跃兴

另一本畅销书《奋斗与托邦》中,由于是热播电视小说《奋斗》的续集,三家品牌的赞助费用分别达到300万元。当然,这300万不仅是植入广告的费用,还包括插页和其他广告费用。在书中,某一国外服装品牌成为女主人公服装设计师夏琳设计的对象、其他人物的日常穿着。通过主人公的设计理念,突出服装品牌的设计理念。通过其他人物的穿着,突出服装的阳光气质。整个品牌贯穿小说始终,让人过目难忘。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藏地白日梦》是一本纯文学小说。一家医药公司在写作之前赞助了这本小说的作者——作家何小竹10万元人民币。作为回报,小说中作者三次对这个企业所用的原材料,进行了描述。

### 未有法律对此界定

之所以能在图书中直接植入广告,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尚未有相关法律条文对此作出界定和说明,而且,利用植入广告手段的人还认为,“之所以很多文化作品选择软广告,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还能打擦边球”。无疑,这对广告主的营销策略和商品利益是极为有利的。但是,他们的商业目的达

到了,大众读者阅读的权益却有了损失——作为读者不免疑惑,翻书也能“被”广告,作家收钱,为什么让读者埋单呢?捧着一本被“植入”了商业广告的图书,我们是在读书呢?还是在看广告?更有读者担忧:现在,作家写小说,挣广告费,只是不知道,以后出版社和别的作家会不会创造新的利益链,动不动就广告分成、广告植入?对读者来说,如果每本书读着读着,就突然来个品牌广告,你能接受吗?

其实,这样的疑虑和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年来,作家及文学写作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也有不少作家为金钱、为财富写作商业性文学,或者相当于商业广告性质的文学,读者在阅读生活中经常被一些所谓畅销书中粗制滥造的广告文字所欺瞒。

### 文学?艺术?

图书中植入广告,是一个文学问题、艺术问题?还是一个营销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产品,以及其他一些精神产品,正处在这样一个日益深刻受到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化影响的时代。在这样

# 翻译家的寂寞与翻译界的清冷

韩浩月

翻译界太清冷了,乃至于如此之重要的一位翻译家去世,都是通过微博这种热闹的网络场所传递出来的。

谢素台拥有着不小的学术声望,她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是这本名著最好的中文翻译版本,被无数人阅读过。她还与人合译或翻译了《生者与死者》、《蝴蝶梦》、《月亮宝石》、《福尔摩斯新探案集》、《维莱特》、《阿赛特》等诸多作品,是中国读者了解俄苏文学的一座重要的桥梁。但谢素台的晚年和其他翻译家一样是寂寞的,这寂寞并非来自中国翻译家对翻译事业的冷淡,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虽至耄耋之年,仍热爱翻译,但在一个明星生子都能占据各大媒体版面的娱乐时代,他们以及他们的翻译工作,却被遗忘了。

翻译界的清冷,或能映衬出版界的浮躁。4年至少翻译出版23本国外著作,“史上最牛译者”的曝光,揭示了出译著出版的种种潜规则;出版商低价聘请大学生当枪手,本该精益求精的翻译工作被剪刀、糊糊代替;有的翻译作者甚至根本不懂外文,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谢素台这样的老翻译家的作品拿过来,再“中译中”一次,换个词语组合方式便诞生了新版本。

译著的泛滥和翻译的门槛变低,让真正拥有学术素养的翻译界被忽视。有人曾爆料某出版商操作译著出版的方式:一口气买下一堆国外出版物的版权,花钱雇廉价枪手翻译,但由于译者已经对大量粗制滥造的译著失去信任,所以,该出版商在屡次赔钱之后只能将手中版权低价转让。而译著泛滥和翻译门槛降低,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识几个斜杠字母就敢在名片上印上“翻译家”称谓,

##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 扼住命运的咽喉

——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在西方,贝多芬享有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因为,贝多芬的音乐中有着一般流行艺术所缺少的高贵品质,它在陶冶人的灵魂、提升精神格调方面,起着特殊作用。

读过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的人,几乎都被他那痛苦的境遇所显示的特别悲壮的精神力量所震动。

《贝多芬传》采用评传的方式,抓住传主一生最重要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对几个创作阶段与代表作,加以突出评述,从而清晰地勾勒出贝多芬悲壮的生命历程。贝多芬整个的童年,都忍受着酗酒成性的父亲的暴行。感受善良的母亲的早逝,给他的童年蒙上了灰暗而苦涩的阴影。26岁时,他又渐渐走入无声的世界,后又几次失恋,几乎把他推到了绝望边缘。耳聋,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如幽居于寂静的山野,是整个世界的毁灭。贝多芬在绝望之中想到过自杀,但是,对人类的崇高精神的追求,对音乐艺术的挚爱深情,使他顽强地活了下来。“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读完《贝多芬传》后,我心中有一团疑惑:是什么使贝多芬这个“贫穷、残疾、孤独”的“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曾给他欢乐……他却用痛苦创造欢乐”给予世界?是什么让一生痛苦的他奏响世间最壮美的音乐,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无愧于“乐圣”之名?我在罗曼·罗兰这本书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是力,是粗犷、豪放的力”,引领着贝多芬勇往直前。

我也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用痛苦创造欢乐!”因此,耳聋以后,孤寂的我重拾少年的作家梦,八小时以外和节假日,我少了常人的谈天说地、电影电视之乐,而钟情于读书、写作、投稿……我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和美好。失去倾听,我用两只眼睛同李白、曹雪芹、鲁迅、雨果、高尔基等中外文学大师交流,也从书海报林中看“三山五岳”的神奇风韵,倾听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的涛声……20多年来持之以恒,收获渐丰,人生也因此显得多彩。

读《贝多芬传》,再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我感叹——我们不要埋怨命运的不公,对于生命,我们更应怀一颗感恩的心,相信自己,相信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给了风雨一定会就会有阳光,给了苦难也肯定会会有甜蜜。无论遭遇有什么样的命运,都要以一颗坚强的心去承受这一切,去坦然面对生活,且把自己的那点不幸当做幸福的刻度。

福建省建宁县城职业中学 宁江炳



书籍中比较少见的。因为作者是知识女性,得以一窥台湾知识女性真貌,更重要的是,以心比心,沟通了两岸知识女性的气质与心灵。

乐艳艳这样描述她眼中的台湾女性:“印象中,真正的台北女人都举止优雅,穿着得体,说话温柔,是真正的淑女。她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独立又不失传统美德。”“因为感恩,所以坚韧;因为善良,所以宽容;因为独立,所以勇敢;因为真实,所以美丽。”这样的感受,是真切。

在两岸关系中,新闻记者是民众的眼睛,是民众的触觉,是民众的认知,所以,如同所有尽职的新闻记者一样,无论是新闻报道或者是文学创作,“态度认真”、“实事求是”是突出的不同其它的特色。乐艳艳的《行走台湾》当然是以此特色为主的。

2009年台湾遇到罕见的大风灾。乐艳艳在她的博客里记述说:“高雄有个小林村,小林村有个小林小学,莫拉克台风登陆南台湾,小林村家园被毁,400多人被土石流掩埋,小林小学40名小学生失踪。看着电视里那些曾经的笑脸,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我想为小林小学做点什么,我知道自己力量太小,帮不了多

## 此中有真味

——《行走台湾》序

郭伟峰

积累下来的最大感受就是:台湾之美,美在中华文化的包容与渗透,这是没有做作的发乎传统文化的大美。有时候,你在大陆的一些地方或许还得不到接触中华文化之美的感动,在台湾,你常常会遇到。

在乐艳艳的笔触中,前清一代名将黑旗军统帅刘永福第四代孙刘铭伟在交趾陶在台湾失传50多年后,开始研究交趾陶烧制艺术。著名抗日客家名将、诗人丘逢甲后人丘秀芷女士的公子符立中承继父母的爱好,喜欢艺术和文学,做了专栏作家和乐评人。中华文化的历史时空,就这样在令人惊叹的文化脸孔中交错纠集,继续往开。

乐艳艳的《行走台湾》还有不少篇幅、段落都表现了台湾的知识女性风采,这是迄今为止大陆记者写作的台湾

大的忙。可我还是加班加点DIY了40件首饰并捐献出来在台北发起了义卖募捐活动……”

读到此处,我不禁深为感动,我知道了,《行走台湾》这本书,在“态度认真”与“实事求是”之外的过人之处是“为文情真”,这三个“真”字,鼎足而立,使得《行走台湾》散发出动人的心香!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其不朽著作《文心雕龙》中明确提出要“为情而造文”,不要“为文而造情”。我认为,乐艳艳的《行走台湾》是两岸新闻交流中一本“为情而造文”的、对沟通两岸人民感情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集。

行走台湾,看得见阳光,也得到阴霾,与地球不是平的一样,台湾也不是平的,如果做一个没有包涵、缺少真情的新闻记者,也可以处处发掘出台湾社会的丑恶来。然而,要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就必须具有明亮的阳光心态。两岸长期隔阂,误解重重,需要的是不是人为地散布更多的阴暗字句。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信息使者,必须执着地以真情去打开两岸相通的心灵窗户。我看到,乐艳艳正在做出这样的努力。真是值得欣慰! (本报有删节)



乔盛,又推出了新著《干部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培养、建设、管理、发展是全社会关注的课题。国家干部的作用直接体现着党和政府政策、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对党的干部、国家干部寄予了很高的厚望,把干部看成是国家富强、社会发展、自身生活走向富裕的引路人。干部作为一种大众公仆、先进阶层、岗位代言的社会角色,其表现出来的一言一行,直接折射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干部论》是思想理论界和人才学领域的一本创新的重要著作。乔盛的《干部论》提出了什么叫国家干部的科学定义,对国家干部的标准从“品德、政治、才能、绩效、形象”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 干部管理科学的创新之作

——读乔盛的新作《干部论》

江风

乔盛认为,国家干部的品质标准包括人实在、办实事、讲话实在三个方面内容;国家干部的政治标准具有阶级性、思想性、倾向性三个特征;国家干部才能标准要从知识标准概念、智慧标准概念、才能标准概念来全面测评;国家干部的绩效标准要从成绩与效果、功绩与效能、业绩与效益、业绩与效率等方面进行衡量;国家干部的形象标准要从“讲文明、讲礼貌、讲文雅、讲卫生、讲行规”与有“亲和力、美感力、外在力”从严要求。

《干部论》设置的国家干部五个方面的“新标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选拔和使用干部问题上,《干部论》针对我国干部体制运行的实际状况,提出对优秀干部和杰出人才选用时,要打破“干部年龄杠杠论”、“干部文凭论”、“干部户籍论”,避免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干部集中出现30岁、40岁、50岁、60岁不同年龄段现象;建设知

的文化环境中,一本图书的文学品质会不会受到影响,如何保持文学艺术这些精神产品的相对独立性和纯洁性,写作尤其是纯粹的文学写作会不会变成金钱赞助的写作,还当然不可能只强调精神上的追求,而回避经济上的追求,但存在这样的可能,就是只有经济上的追求,掺杂进广告元素甚至商业元素,而无精神性的要求和渴望;另外,摒弃一切功利化的、商业化的乃至物质化的因素,保持文化和精神的尊严,这种纯粹理想的状态,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取决于我们的态度。有的文学评论家说得好,“有深度的作品往往具有独立性,与普遍的畅销商品保持着距离,具备着怀疑和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是



成为一大笑话。

曾求学于西南联大,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谢素台的简历如此简单,却能看到翻译工作是贯穿她一生的事业。很大程度上,翻译是比创作更重语言功力的事情。王小波对翻译十分推崇,他把查良铮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译的《情人》当做自己的文学师承,并对他们表达了热忱的敬爱,“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

“我爱他们”,作为读者,我们应对为几代人的精神世界提供文学滋养的翻译家表示敬意,起码也应做到不遗忘、不遗忘的方式是坚持选择那些堪称标杆式的高质量译著,这或是让老翻译家们最欣慰的事情。